

二十世紀中國華北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演變 ——一個口述歷史的考察*

陳耀煌**

摘 要

本文擬利用二十世紀滿鐵與三谷孝等學者對華北農村的調查，重新檢視二十世紀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演變。學者如杜贊奇等人也曾利用滿鐵的調查資料探討1949年以前的華北農村，提出著名的國家內捲化理論。本文除了將重新檢視此一理論外，還欲進一步探究1949年以後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演變。究竟1949年前後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特質有何不同，1950年代、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特質又分別發生了如何的改變，此一改變與外在的客觀環境與國家政策的變遷有何關係。本文將利用前述兩套口述歷史紀錄，佐以其他檔案材料，試圖探究農民眼中清末以來迄1980年代各個時期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不同特質，及其所反映國家政策與客觀環境的變遷。

關鍵詞：滿鐵農村調查、口述歷史、國家內捲化、村莊領導、農村幹部

* 2017年5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1月29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在 1930、1940 年代日本人曾對中國農村進行多次的實地調查研究，其中最著名者即 1940-1943 年間滿鐵調查部慣行班在華北地區數個農村進行的調查訪問，其調查紀錄後來被編為《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出版，為後人留下關於當時農村極其寶貴的材料。¹許多學者曾利用這批資料從事相關研究，如早期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戒能通孝等人即利用滿鐵調查資料探詢中國是否存在如日本農村般的共同體，並掀起著名的平野—戒能之爭；西方學者如馬若孟（Ramon Myers）、黃宗智等人也利用這一批材料發表了《中國農民經濟》以及《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等重要研究。

不過，利用這批調查資料研究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成果卻不多見。本文所謂的中國農村基層領導，指的主要是村莊領袖。民國時期華北地區的自然村平均每村百戶。民國時期的華北農村的基層領導主要係指村長及其他如會首般非正式的村莊領袖。1949 年中共建國後，村逐漸為合作社、生產大隊所取代，這些單位的幹部統稱為村幹部，而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其中最重要的村莊領導就是村（大隊）黨支部書記。

近代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相關的研究中，最著名的就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一書。據杜贊奇所言，鄉紳等傳統中國農村領導產生於具有共同象徵性價值觀念的組織結構，即所謂權力的文化網絡，如宗族或祭祀團體等，所以他們具有一定地方基礎，國家也不得不與此一文化網絡結合。但是二十世紀國家政權的深入，破壞了此一既存文化網絡的一部分，又試圖另外建立新的政治體系，其具體表現就是國家強化對農村的榨取。傳統鄉紳為躲避國家的勒索攤款，咸對公職畏之如虎，不肖人士乃乘虛而入，成為新的村莊領導。後者既不是出於既存的文

¹ 即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東京：岩波書店，1952-1958），全書共六卷。下文引用時，簡稱為《慣行調查》。

化網絡，只是依賴國家的力量為國家與自身榨取農民，結果就導致國家愈深入農村，農民反而更加遠離國家，此即所謂國家內捲化（involution）的現象。²但是，滿鐵的調查資料中卻記載許多與國家內捲化相反的例子，證明了民國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的領導絕不只是如杜贊奇所形容般，「徹底投身於國家政權之中而與村民作對」，以營利為目的的「贏利型國家經紀」（entrepreneurial state broker）。杜贊奇只是揀選其中少數極端的例子來佐證他的論點。再者，不同時代對農村基層領導的要求會隨著國家政策與客觀環境的變遷而改變，所以不能單以是否是出於既存的文化網絡來論斷國家、農村基層領導與農民間的關係。

不同時代對農村基層領導有不一樣的要求，所以不同時代的農村基層領導在出身、文化及能力等方面也會表現出不一樣的特質。杜贊奇的著作只談到1942年，本文擬在這基礎上，繼續檢視1949年後的中國農村是否出現杜書所提到的現象，或者當時中國農村的基層領導又展現出何種特質。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以三谷孝為首的一批日本學者，在魏宏運等中國學者的協助下，多次赴1940年代滿鐵曾調查過的華北村落再進行調查。三谷孝一行人的訪談紀錄已分別以日文和中文的形式出版。³已有學者利用這套資料進行研究，其中與本文有關者是收錄在三谷孝所編的《村から中国を読む》一書中，由同為訪談者之一的浜口允子所發表的〈村と幹部〉一文。雖然在該文中也談到1949年後中國基層農村幹部的特質，但這篇論文更像是已出版訪談紀錄的補充。⁴是故，關於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特質還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本文即是利用前述兩套口述歷史紀錄，佐以其他的檔案材料，試圖探究清末迄1980年代各個時期，農民眼中的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的特質，及其所反映的國家政策與客觀環境的變遷。

²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41, 245-250.

³ 三谷孝等人的訪問原本以日文版發行，近年才重新整理發行中文版。本文所引用的是中文版：魏宏運、三谷孝、張思主編，《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全書共四卷。下文引用時，簡稱爲《調查記錄》。

⁴ 浜口允子，〈村と幹部〉，三谷孝編，《村から中国を読む：華北農村五十年史》（東京：青木書店，2000），頁113-115。

二、1949 年以前的農村基層領導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主要調查的對象是座落在河北與山東兩省的六個村莊（另外還有些零散的村落），分別是：河北省順義縣的沙井村、欒城縣寺北柴村、昌黎縣的侯家營、良鄉縣的吳店村，以及山東省歷城縣的冷水溝莊、恩城縣的後夏寨。這六個村莊的性質並不盡相同。例如沙井村是一個多姓村，村民普遍貧窮，村內無地主，富農極少，中農也不多，大部分屬於貧、雇農。⁵其他村子大多也是以自耕農兼佃農居多。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良鄉縣的吳店村，該村不僅土地稀少，村民大多租佃縣城地主的土地，以致村務易受縣城有力者的影響。在宗族方面，各村大多是多姓村，只有侯家營與後夏寨內部宗族力量影響較大，如侯家營在 1941 年時有 117 戶，其中侯姓就佔了 84 戶，所以侯姓在該村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近代以來，這幾個村莊基層體制的演變雖然存在些許差異，但大體相近。清末時期各村多設有數名會首（或會頭、首事）管理村務，也有一些村子開始設立村長等職，但是要到民國初年，爲了因應國家的要求，如沙井村才開始設立村公會，村長也變爲較正式的職務。1929 年國民政府推行鄉制，百戶編爲一鄉，但此一制度並不普遍。抗戰爆發後，日本人在華北各地推行保甲制，保的範圍相當於自然村，故保長即爲村長，一村數保者即設聯保主任。1943 年前後，華北日佔區開始成立大鄉，一大鄉範圍約爲十保。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繼承了保甲制，直到 1949 年中共建國後才撤廢。⁶

會首是村莊自然生成的領導，即杜贊奇所謂生於既存文化網絡者。不過，正如黃宗智所言，有功名的人很少願意留在村裡，在滿鐵所調查的各村莊中有功名的村莊領導可說是絕無僅有，所以會首很少所謂的鄉紳，而以庶民居多。⁷

⁵ 《慣行調查》，卷 1，〈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的概況〉，頁 75。

⁶ 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 27-38。

⁷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248-249。

因為清末時期村莊領導不太需要和國家打交道，會首的工作主要是管理村莊內部。一般說來，擔任會首的先決條件是人格好，而且以擁有相當土地的人居多。如光緒 11 年（1885）在沙井村的廟的匾額上署名的諸會首中，楊魁、杜榮、楊忠等人都是有相當土地的人。據該村村民所言，因土地多而有閒的人才會當會首，經商或土地少以致沒時間的人就不會當會首。⁸又，因為是自然生成，清末村莊領導較多反映了村內的關係。如後夏寨宗族勢力較大，自清朝以來全村即劃分為三個牌，以避免該村勢力最大的馬姓欺壓他姓。各牌牌長也因此反映了各牌宗族勢力的組成，如東牌牌長為馬姓，中牌為王姓，西牌為魏姓，其中馬與王姓即是該村戶口較多的姓氏，能夠擔任牌長者也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富人。⁹

民國以後村長乃至於保長的出現，則反映了村莊領導逐漸國家化的改變。因為民國以後國家對農村的的要求日益增多，所以縣要求村長由各村選舉，縣當局任命。侯家營在清末時期村莊的領導為九名會頭，會頭就是姓的代表，其中如劉子馨者是劉、葉、池三姓的代表，王子升是王、陳、孔三姓的代表，其他會頭雖然以侯姓居多。但侯姓也有不同門，這些會頭的工作就是管理所代表姓或門的工作，即產生於既存文化網絡的村莊領導。但是，民國以來侯家營先後出現了村正、閭長、鄉長等職務。這些職位是根據上面命令，通過選舉產生。在村正下面尚有會頭，不過那時會頭已沒什麼力量了，是由村正決定村務。到了閭長、鄉長時代，會頭即被取消。原因就是鄉長以來的工作，只是被動地執行縣的命令，完全不需要與會頭商談。如此一來，村務就逐漸被置於國家的支配之下。1940 年大鄉制成立後，鎮長（大鄉的首長）的權力非常大，干涉村莊事務。侯家營在大鄉制成立之初的保長（即相當於該村過去的村正、鄉長）劉子馨，因為不聽鎮長的話，所以鎮長不喜歡他。後來保長換侯元廣擔任，後者幾乎成為鎮長的傀儡，反對保長就是就反對鎮長。¹⁰在這種情況下，保長當

⁸ 《慣行調查》，卷 1，頁 124-125。

⁹ 《慣行調查》，卷 4，頁 408、424。

¹⁰ 《慣行調查》，卷 5，頁 7、11、19、43、50。

然有可能越來越脫離所謂既存的文化網絡，成為杜贊奇所謂爲了國家與自身利益而犧牲村民權益的「贏利型國家經紀」。另外如良鄉縣吳店村由於許多人租種縣城裡地主的土地，難免較易受到縣城裡有力人士的左右。1940 年左右該村爆發參議（即村長）趙鳳林侵吞畝捐 90 圓的情事，1942 年又爆發參議張啓倫貪汙的情事。張只是一位年輕人，他會當選參議純粹是因爲縣城裡某位有力人士的推薦。¹¹這也是國家內捲化的一種表現。侯家營與吳店村的例子即被杜贊奇用來佐證他的理論。

所謂「贏利型國家經紀」也不能爲所欲爲，如趙鳳林和張啓倫後來都被迫要求還錢。又如侯家營的村正、保長雖然越來越多受到國家的影響，但是該村在清末時期作爲劉、葉、池三姓代表而當選會頭的劉子馨，他在民國後也曾擔任村正，大鄉制成立之初還擔任保長，所以當時侯家營的村正、保長也不只是國家的代理人。劉還攻擊與鎮長關係很好的新保長侯元廣，這難道不會是出於該村既存的宗族或私人矛盾嗎？再如沙井村與後夏寨的會首或牌長等生於既存文化網絡的村莊領導，在日本人推行保甲制時也只是被改名爲甲長，繼續對村莊事務發揮影響力。故不宜把民國以後的村莊領導單單當成所謂贏利型國家經紀，忽略其所出的既存文化網絡。

但這不是說文化網絡是決定民國村莊領導產生的主要因素。從村莊領導的財產來說，如前所述，會首等自然生成的村莊領導大多是有土地的富人，因爲這些人才有空閒。可是民國以後看重的不再只是村莊領導的土地與財富。冷水溝村民就說晚清時選村的領導是看土地，民國以後選莊長（即村長）是用投票，村民會選擇最有信用、公平、急公好義、待人接物和善，以及有能力的人。日本人來調查時的莊長是杜鳳山，他在 1928 年時就被選上。杜不識字，土地也只有二畝。事實上他不想當莊長，但被村民選上且獲得縣府的任命以致無法推辭，而且一做就是十多年，期間多次推辭仍不可得，可見村民如何地信任他。不過，杜雖不是有土地的人，但他有養 250 隻鴨，不能說是窮人。而且在他擔

¹¹ 《慣行調查》，卷 5，頁 421-422。

任莊長之時，他下面仍有八位首事（該村分為八段，每段一位首事），即該村傳統的領導，他們都是土地較多的人。¹²有趣的是，過去會首所以限定有一定土地的人，而不允許經商的人，是因為前者較有空閒，後者沒有時間。但是如杜鳳山的例子，他所以一再想要辭去莊長一職，就因他為了養鴨而沒有時間，這正也突顯了村民對他能力與為人的信賴。而這些特質在過去強調土地擁有數量的情況下，很容易被掩蓋與忽略。

當然，財富還是村民選擇村莊領導時的一個考量因素，然這也是為了應付國家的需求。日本人來訪之際，沙井村的保甲長很多都是由過去會首擔任，有的如保長楊源般，從父兄輩開始即在村內擔任會首等領導，而且他們也都是富人。與過去的會首不同，他們並不全然是靠土地致富，如楊源的副保長張瑞，本來是個窮人，後來靠著買賣和做蜜供（沙井村的主要副業）成為村裡最富有的人，並買了 90 畝地。¹³村民說副保長要由富人擔任，因為納錢糧時可能需要他幫忙墊錢，保長則不用富人擔任。事實上楊源也有一定資產，他在縣城經營首飾店，也不單純是靠土地致富。從冷水溝與沙井村的例子即可發現，民國以後的村長、保長與傳統的會首等村莊領導相同，都是由具有一定財富者擔任。不同的是，民國以後村莊領導財富的來源更加多元化，不再限於土地，而且其財富是作為應付國家需求的保證，不是像傳統的會首般是有閒的象徵。所以民國以來村民更重視的是村莊領導應付國家的資財，以及能力。

這裡所謂村莊領導的能力，受訪者的回答各式各樣，有的說是對村內事務的了解，有的說是有信用、公平，還有的是指待人接物和善等等。文化程度也是一個衡量指標。如當時沙井村有一位吳殿臣，他的祖父是秀才，所以吳殿臣的文化程度較高，是村裡的小學教員。據村民所言：「吳殿臣是知識份子的威望，村長是權力的威望。村長也不敢小瞧（吳）。」¹⁴又如 1938 年以前擔任寺北柴村村長的張樂卿，家裡有很多藏書，在鄉裡頗富名望，張受到敬重與其

¹² 《慣行調查》，卷 4，頁 6、24、25。

¹³ 《慣行調查》，卷 1，頁 90、96。

¹⁴ 《慣行調查》，卷 1，頁 90、96；《調查記錄》，卷 2，頁 42。

文化水平高也有關係。不過，張的繼任者郝國樑文化水平就遠不如他，而是因為「人緣不錯，他做過買賣，也聰明，辦事也不錯」，所以被選為村長，加上張、郝二人也都有一定的財產，只是不如同村最有錢的郝白子等三人。¹⁵可見文化水準並非民國時期擔任村莊領導的必要條件，如冷水溝的杜鳳山甚至還不識字，但也持續做了十多年的莊長。

那麼對於民國以後的村莊領導來說，最重要的能力是什麼呢？那就是應付國家需求的能力。民國時期的村莊領導雖然沒有領取國家薪資，然而在村民眼裡，村長就是「一個當官的」。¹⁶村長要為國家徵收地方資源與傳達政策，如果村長不能滿足這些需求，難保村莊不會被找麻煩。故民國以後的村長被要求具備處理國家行政事務的能力。如沙井村在 1926-1928 年有一位村長叫周樹棠，他十七、八歲以後就到江蘇、安徽、江西各地擔任收發吏、稅務局長等職，其對外界的見識與豐富的公家人員經歷，與他被選為村長不無關係，只不過他後來太忙碌，還是辭去村長的職位。¹⁷

抗戰爆發以後，村長不僅要滿足國家的需求，還要支應各派政治勢力。如抗戰時期後夏寨的保長吳玉衡就是因為會辦事，所以才當選保長。如何說會「辦事」呢？原來當時有日本人、八路軍，還有偽軍會到村裡來，吳玉衡得支應各方，防止他們鬧事。據村民回憶，有一次日本人來調查，遇到八路軍便衣隊，八路軍要把日本人帶走。吳玉衡因此向八路軍求情，說如果把日本人抓走了，村裡就麻煩了，我也活不了，因此八路軍就沒有抓他們。¹⁸

吳玉衡的例子告訴我們，有時候村莊領導的能力是以對外的「關係」表現出來。在抗戰時期的吳店村，某次八路軍（有人說是土匪）路過該村，該村向日軍通報的人去晚了，日軍因此以為該村與八路軍勾結，先把保長傳喚去拷打，後來還要放火燒村。幸好該村有個人在良鄉縣城裡當小學校長，與日軍關

¹⁵ 《慣行調查》，卷 3，頁 28-29、37；《調查記錄》，卷 1，頁 62、72。

¹⁶ 《調查記錄》，卷 1，頁 135。

¹⁷ 《慣行調查》，卷 2，頁 311。

¹⁸ 《調查記錄》，卷 3，頁 73。

係較好，透過他向日本人求情，吳店村才逃過一劫。然而鄰近吳店村的米良屯村就沒有這麼幸運。該村也因為發生土匪，日軍知道了就進村，燒燬房屋，見人就殺，約百餘人遇難。¹⁹這位代吳店村向日本人求情的人叫趙權，他在抗戰爆發後就移居城內擔任小學校長，雖然不是村長，村民還是把他當作吳店村最有力的人物。趙權有學生在良鄉以外的涿縣、房山等地任教，所以趙在這些地方也很有影響力，村民有事就會去拜託他。²⁰有趣的是，如前所述，吳店村容易受到縣城有力人士的影響，乃至有不肖人士在縣城有力人士的支持下當選村長；不過從趙權的例子看來，縣城有力人士對吳店村的影響，恐怕不限於負面的而已。

當然，要支應各方政治勢力並不容易。如抗戰時期的沙井村，保長即要為日軍、國軍、共軍、偽軍乃至於地方土匪籌糧籌款。正如村民所言：「誰來為誰幹，兩面都管，誰敢把誰得罪了？」這樣的差事當然不好當，如沙井村村民楊慶餘的父親就是因為幫八路軍辦事，被國民黨抓了去。²¹共產黨方面對保長也頗不客氣，八路軍出身的後夏寨村民李海彬就說，在中共看來，保甲組織是日本人的機構；要是「偽保長」不替共產黨辦事，「就把他腦袋割下來」。²²保長當然也會害怕。在抗戰時期的寺北柴村，即使村民分攤給保長一年四、五百斤的米，也沒有人願意做保長。最後當選保長的郝國樑經常不敢住在自己家裡，而寄住別人家。²³

儘管吃力不討好，一旦被選上，這些村莊領導還是會兢兢業業地扮演好他的角色。如抗戰時期沙井村在保長之下設有六個甲長輔助保長，他們同樣是無給職，但都情願做，是為全村的緣故吃苦。²⁴前面提到冷水溝的杜鳳山屢次提出辭呈都不可得，仍盡忠職守於莊長的職務，所以村民才會信賴他，持續選他

¹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658、692、721、751。

²⁰ 《慣行調查》，卷 5，頁 445。

²¹ 《調查記錄》，卷 2，頁 29、40。

²² 《調查記錄》，卷 3，頁 111。

²³ 《調查記錄》，卷 1，頁 65。

²⁴ 《慣行調查》，卷 1，頁 102。

擔任莊長。當然，若是可能，這些村莊領導仍會選擇辭去職務。如沙井村的楊源也爲了經營縣城裡的首飾店而沒有時間，一直想要辭去保長職務。1941年該村開始推行大鄉制前後，有次楊源從警察分所回來，告訴副保長張瑞說分所長要你當保長，張無可奈何接下這個職務。有人說讓張瑞當，是因爲張瑞是有錢人，如果縣裡有要求，張瑞就要出錢。²⁵無論如何，這裡要說的是，儘管民國時期的村莊領導沒有報酬，還吃力不討好，甚至可能丟了性命，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願意擔任村莊領導的都是只知謀利的「贏利型國家經紀」。

進一步說，這些村莊領導或許不全是出於杜贊奇所謂既存的文化網絡，但是他們都盡可能保護村民的安危與利益。事實上，大部分的村莊領導都有其兩面性，一方面協助國家和各派政治勢力徵收地方資源，另一方面又竭力保護自己與地方群眾的利益與安危。眾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時期的華北地區，地方村民會組織紅槍會等秘密會社團體以圖自衛。這些武裝團體與國家和各派政治勢力存在著既對抗，同時又和平共存，乃至於合作的關係。如後夏寨在抗戰時期就有組織紅槍會，日軍只是把紅槍會改編爲保甲自衛團，默許其爲村莊自衛的目的繼續活動。²⁶

沙井村也有先天道的秘密會社組織。大多數的受訪者咸指摘該組織強迫村民入會、欺騙村民等惡劣行徑，但綜合各人的說法，先天道在沙井村及其周圍地區的勢力很龐大，如沙井村就有90%以上的勞力加入。如此龐大的會眾，很難相信都是被強迫加入的。一位受訪者也透露，先天道與維護地方治安有關。日軍對於先天道的態度則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即兩者雖然互相反對，卻誰也不碰誰；若說不反對，但誰也不歡迎誰。先天道在沙井村的領導是楊潤，他是保長楊源的弟弟，也是該村會首，還是個新民會會員。由此見得，看似順服的村莊領導人，也捲入這些帶有濃厚自衛色彩、甚至有時會反抗國家的自衛性秘密會社團體。²⁷

²⁵ 《慣行調查》，卷1，頁188。

²⁶ 《調查記錄》，卷3，頁20。

²⁷ 《調查記錄》，卷2，頁173-175；《慣行調查》，卷1，頁90。

在地方秩序維持平衡與穩定的狀態下，這些秘密會社團體與各派勢力尚能相安無事。一旦有人破壞了此一平衡，衝突就難以避免。如沙井村的先天道即因與八路軍發生衝突，最後被後者打敗，以致解體。據受訪者所言，兩者的衝突起因於兩位八路軍的偵察員跑到先天道的地盤，發生了誤會，其中一位被打死，另一位逃回向八路軍報告。八路軍因此向先天道發動攻擊，打死了先天道的道長，道眾作鳥獸散。另一位受訪者也說，原來八路軍和日本也贊同先天道，後來八路軍派代表與先天道商談聯合，沒想到代表被後者扣了，才發生衝突。這就證明了兩者間原來是存在著「又反對，又不反對」的關係，但究竟發生了什麼誤會，破壞了此一平衡，導致衝突，眾說紛紜。無論如何，日軍（也有受訪者說不清楚是哪一方面的政權）隨後乘機到村莊裡沒收先天道的大刀，先天道從此一蹶不振。²⁸如此看來，有機會的話，國家更傾向於消滅這些自發性的秘密會社團體。吳店村也有被稱為九宮道（也有受訪者稱其為慈善會、一貫道）的秘密會社團體，其在吳店村的領導叫禹國海，曾當過保長；在良鄉的領導叫張雲波，是個地主。²⁹他們都是村莊領導，也是秘密會社團體的首領，在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全都被鎮壓了。

總而言之，民國時期的村莊領導是件苦差事。他們一方面要幫助國家和各派政治勢力徵收地方資源，若是可能，也要竭力保護自己與地方村民的利益與安危。但是，後來中共官方的宣傳卻懷疑與批評民國時期的村莊領導，特別是抗戰以來曾擔任保甲長者。連杜贊奇等學者也指摘這些人是所謂的贏利型國家經紀。某些村莊，如抗戰時期的吳店村，確實一度出現這類村莊領導，但不應以偏概全。根據各樣的調查與口述訪談材料，更多的村莊領導毋寧是帶有兩面性。如前面提到沙井村的張瑞，有人說因為他是富人，所以縣裡才選他擔任保長，好要他出錢。張瑞同時也很受村民的敬重。據說有一次八路軍要求沙井村派一位青年參軍，張瑞就用自己的十畝地雇了一個外地青年去參加八路軍。所以張瑞與村人關係很好，有村民就這樣評論張瑞：「他跟大家一樣」、「日本

²⁸ 《調查記錄》，卷 2，頁 180-181、545。

²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684。

人來時，我們跟一家人一樣」。³⁰即使這些村長不是出於杜贊奇所謂約定成俗的文化網絡，但誰能說村民不認同他們呢？

三、1949 年以後農村基層領導的轉變

1945 年抗戰一結束，中共即派遣軍隊佔領過去日佔區的農村。滿鐵所調查的村莊中，有的如後夏寨在 1945 年即被中共佔領，有的如沙井村要到 1949 年才被共軍佔領。有些村莊共軍一佔領後立即著手批鬥保長。如吳店村的保長趙顯章就遭到批鬥，只因他的一個兒子參軍，沾了軍屬的光，他們家在土改時才被劃為貧農，但實際上又不被當作貧農看，如當時全村貧農開會討論分配土地時，認為他們不可靠，就不讓他們家參加。後來他的兒子、孫子也不讓當幹部，也不讓入團，皆因他們家有歷史問題的緣故。³¹不過，各村的情況不盡相同，如寺北柴村的保長郝國樑就沒有遭到鬥爭，而且在土改時還被劃為貧農，他的兒子郝小壽在文革時還擔任村裡一個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人。如前所述，郝國樑也具有一定財產，他只是因為土地少才被劃為貧農。同村的前保長張樂卿一家卻被劃為富農，遭到鬥爭。³²在沙井村，過去被村民當成「跟一家人一樣」的保長楊源、張瑞等人，也沒有因保長的身分而被鬥爭，只是他們也都被劃成富農，部分財產被分給其他村民。如此看來，由於作保長而遭到鬥爭的並不多，他們大多是因為被劃成地主、富農而遭到鬥爭，或者如吳店村的保長禹國海般，是國民黨員，又是會道門頭子，所以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時遭到槍斃。³³

保長不必然被鬥爭，也許正因村民本身實際上並不是那麼恨惡保長，儘管中共建政後不斷宣傳保長的罪惡以及貧僱農如何地恨惡保長，對其進行泄憤清算。³⁴至於被劃為地主、富農者，有的如在國共內戰時期即已開展土改的後夏

³⁰ 《調查記錄》，卷 2，頁 30、361。

³¹ 《調查記錄》，卷 2，頁 658-661。

³² 《調查記錄》，卷 1，頁 71-75。

³³ 《調查記錄》，卷 2，頁 794。

³⁴ 《調查記錄》，卷 2，頁 831。

寨般，遭到隔離關押以及殘酷的鬥爭。³⁵然而在 1949 年後才開展土改的沙井村，村民反而同情地主、富農，認為他們根本沒有那麼多的財產、勢力，所謂的地主、富農不過「只是一名目」罷了。該村被劃為地主的邢永利就說，他被劃為地主，而同村的老保長張瑞有較多的土地卻只被劃為富農，係因邢家是外來戶而張瑞是老戶的緣故。³⁶如此看來，階級鬥爭不能完全抹殺村民對老保長的感念。

儘管如此，階級鬥爭對農村的人際關係還是造成了難以抹滅的傷痕。如屬於中共較早佔領的老區寺北柴村，該村前保長張樂卿雖已過世，但他的兒子張仲寅仍舊被劃為富農，並被指控雇工剝削，貧農團要他站在台上，群眾高呼打倒張仲寅。³⁷屬於新區的沙井村沒有出現如老區般激烈的階級鬥爭，但地主、富農的財產仍遭到分配，如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的邢永利就承認，他家在土改時部分廂房被分給別人住以後，表面上還是要和這些鄰居和睦相處，心理上卻是不滿。當時領導沙井村土改的農會主任張麟炳也說，這些地主富農當時不是不發牢騷，只是不敢發，回家才發出來。³⁸

隨著國家控制的深入，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慢慢地滲入到村民生活當中，地主、富農也更進一步遭到村民排擠。如寺北柴村的富農張仲寅在互助組時就因為成分不好，所以村民不願意與他編組。³⁹被劃為富農的沙井村前村長楊源一開始沒有遭到村民的排擠，他和他的弟兄還和新村長李祥林等人組成沙井村最大的互助組；不過到了初級社建立時，上層要求不讓地主、富農入社，楊源也被排擠出去。直到後來高級社建立，也是因為上層的要求，包括地主、富農在內的所有村民才全部被編入合作社內。對階級異己分子的排擠，也表現在一

³⁵ 《調查記錄》，卷 3，頁 98。

³⁶ 《調查記錄》，卷 2，頁 32-33、186。其他村的村民也反映了土改劃階級的不合理。如吳店村有一位寡婦有土地四、五畝，都租出去讓人種，靠地租過活，因此被劃為地主，但實際上她只是個窮苦老百姓。《調查記錄》，卷 2，頁 723-724。

³⁷ 《調查記錄》，卷 1，頁 158。

³⁸ 《調查記錄》，卷 2，頁 45、66。

³⁹ 《調查記錄》，卷 1，頁 66。

般日常生活上。如沙井村前保長富農張瑞之子就說，他到 30 歲才結婚（在當時的中國農村算是相當晚婚），源自他家庭的成分屬於富農。⁴⁰

到了文革時期，這些地主、富農等「黑五類」分子，遭到更殘酷的對待。如沙井村的張瑞、楊源等人即被罰掃街、挑大糞，以及給大隊的豬場壘牆等等，都是人們不願幹的事，而且他們都是在農業勞動之餘被迫加班加點作這些勞動，更不好受。⁴¹又如寺北柴村的富農郝中林，實際上他根本夠不上富農，但是土改時還是被劃成富農，部分家產被沒收分給村民。他有一個兒子郝三頭把當時他家被分的東西記錄下來，文革時因此被批評想反攻倒算，遭到鬥爭關押，等到放回來時已經發瘋，沒多久就死了。⁴²前述在抗戰時期替吳店村向日本人求情的小學校長，到了文革時期也遭到解職與鬥爭，雖然吳店村因感念他為該村說情，「沒怎麼鬥他」。⁴³

階級鬥爭撕裂了農村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使得 1949 年後的中國農村開始出現了某種斷裂性的轉變。此一斷裂性，也表現在 1949 年以後農村基層領導的特質上。

如前所述，1949 年以前能夠擔任農村基層領導者，多具有以下特質：第一，家裡有一定的土地和財富。清末時期的村莊領導多是具有較多土地者，民國時期村莊領導的財富來源變得多元化，但還是具有一定的財富。第二，清末時期的村莊領導只需管好村內的事，民國時期的村莊領導則須具備應付國家和各方政治勢力的能力。如寺北柴村保長張樂卿不僅文化水平高，當日本人來時，他也能夠與日本人溝通，因此受到村民敬重。又，為了與國家與各方勢力

40 《調查記錄》，卷 2，頁 362、466。

41 《調查記錄》，卷 2，頁 47。

42 《調查記錄》，卷 1，頁 139。

43 《調查記錄》，卷 2，頁 782。關於這位校長的遭遇，該村村民的說法不一。有人說他在文革時才被解職，遭到鬥爭。也有人說他是富農分子，合作化時遭到管制，加上是國民黨員，所以被強迫勞動。但他從小不會勞動，結果在大躍進時期因為不勞動不給飯吃，他就絕食死了。《調查記錄》，卷 2，頁 775。無論如何，這位校長並沒有在土改時就遭到鬥爭，而是到後來階級鬥爭深入後，才遭到更殘酷的對待。

打交道，有關係也很重要。像是吳店村延遲報告八路軍路過該村，差點招來滅村之禍，和日本人有關係的小學校長去說情，日本人才放棄燒村的打算。

但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後，眾所周知，財富不再是能否擔任村莊領導的有利條件，反而會招來地富階級的臭名，遭到批判鬥爭。相反的，窮人反倒獲得青睞，被提拔為幹部。在每個村皆是如此，過去的保長在共軍來到後即被解職，由窮人取而代之。如寺北柴村的郝吉祥因為「家裡什麼都沒有」，有人勸他加入共產黨他就加入了，土改時還擔任第一任村長，他當時大約 34 歲左右。同村的王補子（第一任村黨支部書記）、張歪子、李老高等也都是村裡最窮的人，還是長工、短工出身，他們也在土改時入了黨，當了幹部。⁴⁴在吳店村，共軍來了後，就找趙鳳鳴等窮人來幫忙；後來土改工作隊又介紹王德林入黨。王生於 1930 年，是一個佃農，他日後成為該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953 年去當工人，由趙鳳鳴接任支部書記。趙鳳鳴生於 1924 年前後，父親拉黃包車兼種地，因家境清寒，趙本人上了一年的學就輟學了。1943 年父母雙亡。1949 年共產黨來了後，他積極響應，與妻子一同加入共產黨。夫婦兩人非常積極，據其妻所言，當時「解放了，土改了，心情愉快，幹什麼都很積極」。趙鳳鳴本人後來也步步高升，先後擔任村支部書記，還有鄉長等職。⁴⁵

這裡需要先簡單地介紹一下中共建國後村莊的統治體制。中共建國初期在村一級建立政權；1953 年併村劃鄉，鄉取代村成為農村最基層的行政單位。伴隨著農業生產集體化的開展，在行政單位的村、鄉以外，作為集體生產單位的合作社及其下的生產大隊與生產隊陸續出現，並且逐漸取代鄉，成為中共統治農村體制的一環。在大躍進以後，合作社合併成人民公社，其下仍設有生產大隊與生產隊。一般說來，大隊的規模相當於自然村，滿鐵所調查的這幾個村莊在集體化後也都成為大隊，大隊長即等同於村長。除了大隊長外，村裡還有會計、婦女主任、民兵隊長等其他幹部，一般統稱為村幹（部），由他們共同領導村務。但是中共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村裡最高的領導者毋寧是以村為單

⁴⁴ 《調查記錄》，卷 1，頁 68、238。

⁴⁵ 《調查記錄》，卷 2，頁 710-712、732-735。

位設立的黨支部書記。一般說來，大隊長等管生產、行政等事務，書記抓黨務與政治、思想工作，不過無論什麼事都要書記點頭。⁴⁶侯家營村民即說「村看村，戶看戶，大隊就看黨支部。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幹部，幹部看支部」。即一個村工作的好壞最終取決於黨支部，這也突顯了中共農村統治體制的獨特之處。⁴⁷

這些新上任的村幹部，因為都是貧苦人家出身，如吳店村的趙鳳鳴般，文化程度皆不高。寺北柴村土改時的幾個幹部如郝吉祥等人也全都不識字，沒有文化。⁴⁸為了順利推動土改，中共會給予這些新幹部一些訓練與教育。如沙井村土改時的農會領導之一張麟炳，共軍來時才 23 歲左右。他是保長張瑞的本家，但不如張瑞家富有，而是貧農。共軍來了以後，張麟炳被選為代表，去鄰近的天竹村與他村的代表一同學習土地法大綱，回來後召開全村貧下中農一同學習。⁴⁹當然，這些短期訓練在提高幹部的文化程度上，仍相當有限。

中共占領這些村莊之初，因為不了解該村的實情，會傾向依據成分的好壞選出幹部，以便推動土地改革等工作。但是成分好不能保證個人作風沒有問題，如中共於 1945 年占領後夏寨後先後提拔了多位幹部，其中第一任農會主任劉長貴就是一個抽白麵（吸海洛因）的，他才當了一年主任就被換了下來。⁵⁰寺北柴村某位土改幹部趙德山，後來也被中共槍斃了。⁵¹待政權穩定後，中共就會透過「選舉」等名義，汰換土改時期匆促被提拔起來卻作風不良的幹部。⁵²如寺北柴村在 1950 年代初期汰換幹部的頻率就很高，幾乎一年就汰換一次。

⁴⁶ 《調查記錄》，卷 2，頁 59。

⁴⁷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30。

⁴⁸ 《調查記錄》，卷 1，頁 138。

⁴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63-66。

⁵⁰ 《調查記錄》，卷 3，頁 430-431。

⁵¹ 《調查記錄》，卷 1，頁 138。

⁵² 在北京市郊區，市當局也對土改時被提拔起來的村幹部相當不滿意，指摘他們民主作風不好，能力水準低。自 1950 年北京市郊區農村土改結束以來，市當局即透過「選舉」等名義汰換村幹部。僅在 1951 年上半年村人民政府改選中，就有將近半數的村幹部被「選掉了」。〈北京市人民政府郊區工作委員會 1950 年工作總結〉（1951/2）、彭真，〈在北京市第三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1/6/24），北京市檔案館等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51》（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冊 3，頁 195、385。

大約到 1953-1954 年左右徐孟祥上台後才穩定下來。徐本人後來擔任合作社社長、大隊長、支部書記等職，直到 1965 年左右四清運動時才下台。⁵³

不僅止於成分論，幹部個人的行事作風與能力也是一項重要的考核標準。如沙井村土改的領導者之一李祥林也是沒念過書的貧農，土改時他大約 40 多歲。李在土改後繼續擔任村長，一個原因是他被誇讚是「能人」、勞動模範。⁵⁴又如寺北柴村的徐孟祥，他所以能夠長時期擔任幹部，不僅因為他是貧農，還因為他積極響應上層組織起來的號召，在 1953 年時首先提出成立互助組。兼之徐有工作能力、有信用，因此獲得工作隊的提拔，通過全村選舉成為村的領導。⁵⁵這裡的能力，如後夏寨村民所言，主要在於能否做好生產，能否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另外如辦事公道、在群眾間有威信、不怕麻煩、不辭辛苦等等，也是村幹部的必備條件。當然，更重要的是能夠把上層的決定貫徹下去，畢竟能否當上村幹部，最後仍取決於黨的意願。不過，黨也不能完全忽視群眾的選擇，蓋村幹部如果在群眾間沒有威信，上邊的精神貫徹不下去，黨也不能不作調整。⁵⁶通常越是底層的幹部，越需要在群眾間有威信的人來擔當。像是沙井村的張麟富在高級社時擔任生產隊長，當時村裡有兩個生產隊，兩個隊都爭著要他去當隊長，他認為他從小就投入生產，知道怎麼做地裡的活，所以兩個隊才爭著要他。⁵⁷

所以 1949 年以後中共係依據成分、農業生產與組織領導群眾能力，還有對上級的服從等標準，提拔農村幹部。甚至中共還打破了性別界線，提拔婦女擔任幹部。如大躍進時期沙井村全村分成兩個隊，每個隊配有一個婦女隊長，其下還有小組長，負責管理婦女的生產。這些在 1950 年代即擔任幹部的婦女文化程度更低。雖然當時中共為婦女開辦識字班，但婦女群眾忙於幹活，實際上也認識不了幾個字。和男性幹部一樣，她們也是因為生產能力受到提拔，如

⁵³ 《調查記錄》，卷 1，頁 272-273。

⁵⁴ 《調查記錄》，卷 2，頁 33。

⁵⁵ 《調查記錄》，卷 1，頁 116、274。

⁵⁶ 《調查記錄》，卷 3，頁 217、420-421、426。

⁵⁷ 《調查記錄》，卷 2，頁 169。

擔任沙井村女隊長郭素蘭與李祥林一樣，在 1949 年以後一直是老勞模。她津津樂道地回憶說，1950 年代共產黨的幹部腳踏實地，像是宣傳時連來自縣的幹部都要親自下村，一家一戶地向群眾宣傳。儘管樂在其中，郭素蘭本身作為一位生產隊長，生產時也要帶頭，特別是在大躍進時還要南征北伐出外協助興修水利工程，所以她也承認那時候當農村幹部特別累。⁵⁸

從郭素蘭的經驗，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 1950 年代農村幹部的工作狀況。事實上，農村幹部有不同層級，並非所有農村幹部都像郭素蘭般要帶頭下去生產。如 1955 年 11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即規定，合作社內因為參加社務工作不能經常參加生產勞動的工作人員，如社長、會計員等，可由社員大會議定，補助適當的勞動日。⁵⁹到了人民公社時期，當時中共當局如北京市委在 1960 年即指示公社幹部每年至少要參加勞動三個月，大隊幹部四個月，隊幹部則是經常帶領社員勞動。⁶⁰由此可見，只有像郭素蘭般的隊級幹部，才要帶頭參加生產。

不過，即使不用帶頭生產，幹部在生活各方面也都要以身作則。如沙井村的大隊長杜作新的父親在 1960 年代初期過世，當時因為國家反封建迷信，杜身為幹部，即使不願意，也要為群眾作表率。當他父親出殯時，幾位幹部就在門口盯著，連親戚朋友都不讓來，最後就只有幾個人抬著一口棺材到墳地去了。吳店村的郭仲安是文革時該村某派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他在 1961 年結婚，適逢困難時期，兼之本身作為一位積極分子，他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辦桌。只是

⁵⁸ 《調查記錄》，卷 2，頁 118-121。不過，當時雖然各生產隊都要配備婦女幹部，但實際上這在很多村莊只是形式。據北京市委於大躍進時期在長辛店公社南崗洼大隊的 21 個生產隊的調查，其中有 9 個隊既不吸收女隊長參加研究工作，也不告訴女隊長記工的辦法，而且這 21 個隊仍是由男隊長分派女社員工作。所以發生此一現象，一方面是由於農村裡男性幹部與社員仍瞧不起女性的緣故，女性幹部本身不夠主動與大膽，也是一個原因。〈中共北京市委對豐台區委關於男女同工同酬問題的報告的批示〉（1959/8/8），《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59》，冊 11，頁 584。

⁵⁹ 〈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1955/11/9），《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 330。

⁶⁰ 趙凡，〈關於當前北京郊區農村人民公社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0/3/29），《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60》，冊 12，頁 319。

村幹部偷偷給他 200 斤麥子，還有他在酒廠工作的朋友給了他酒，他才可以在晚上偷偷地招待人。⁶¹

在 1949 年後作為一個農村幹部，並不容易。一方面，幹部津貼不多，像是最底層的生產隊幹部就完全沒有領取國家薪水，但是他們卻是最接近群眾、工作最繁忙的，如郭素蘭就是一個例子。另外，生產隊長還要負責分配工作，前一晚就要把「第二天的活都安排好」，「得不讓大家閒著」。⁶²這是最難的事，難免會引起群眾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一直到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各村廢除生產隊體制為止，生產隊長一直是農村基層最累，也是人們最不願意幹的差事。如沙井村的杜江在 1980 年代初期曾擔任該村的生產隊長，那時沙井村有兩個生產隊，每隊有正、副隊長各一人。據杜所言，大隊支部書記的工作雖然辛苦，還不如生產隊長，因為後者要直接面對村民，處理千頭萬緒實質的問題。書記只要下個命令就行了，隊長則要每天到生產隊分配工作，還要親自下地勞動。杜江說，他當隊長時夜裡想到明天要幹什麼，就拿出筆記本來寫，經常失眠，睡不著覺。⁶³

但是，為了順利推動工作，幹部有時也顧不得群眾的意願，而必須採取強迫命令的手段。如杜江就說，隊長分配工作時，如有人不服，先是說服，如果「說了還不服就該強制了，您去也得去，您不去也得去」，要不然就扣工分。⁶⁴通常外來幹部會比在地幹部更傾向於訴諸強迫命令的手段，以貫徹政策。自 1950 年代以來，中共為推動各種運動會常態性地派外來工作隊駐在村裡，如據寺北柴村的村民回憶，1951 年開始中共先後推行互助組、合作社，雖然人民心裡傾向各幹各的，但工作隊一直駐在村裡做工作，在組織高級社時還採取如「不入社就不給你」糧食之類的威脅辦法，最後村民沒辦法才都入社。⁶⁵不過即使同樣是在地出身的幹部，隨著政治運動的開展，特別是到了大躍進時

⁶¹ 《調查記錄》，卷 2，頁 106、676-677。

⁶² 《調查記錄》，卷 3，頁 205。

⁶³ 《調查記錄》，卷 2，頁 194。

⁶⁴ 《調查記錄》，卷 2，頁 195。

⁶⁵ 《調查記錄》，卷 1，頁 223-224。

期，他們也會訴諸強迫命令的手段。如寺北柴村大隊民兵幹部劉鳳林在大躍進時，爲了煉鋼與強迫村民到食堂吃飯，把人家的鍋端來了，後來他在四清運動時就因此遭到批評。同村的黨支部副書記、團支部書記劉寶貴在大躍進時期管過食堂，當時村民生活困難，劉自己家裡生活不困難，卻爲了貫徹政策，動不動就不讓村民到食堂吃飯，以此懲罰村民；那時村民許多因爲饑餓，到地裡偷點玉蜀黍和紅薯吃，劉抓到了就綁起來吊到樹上打，因此村民對他相當憤恨。劉本人在受訪時還堅稱當時村裡雖然比平時死的人多，但沒有人因爲沒飯吃餓死的，只是有點病，肚子再餓點就死了。然根據同村其他人的回憶，該村在大躍進時餓死不少人。⁶⁶

由此看來，與群眾的意願比較下，幹部更關心的仍是上面的政策能否又快、又好地被貫徹，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當時爲了呼應上面的號召，農村幹部普遍浮誇虛報產量，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據時任寺北柴村大隊長劉文生的說法，那時幹部很難當，你要當先進，就要說瞎話；如果你不虛報產量，到時公社開會，你就要站起來挨批鬥。有的幹部也會乘機爲自己謀利。如同樣是寺北柴村的大隊會計趙球子，大躍進時期很多村民餓肚子，甚至吃野菜和樹皮，他家卻有吃有喝，因爲大隊的糧庫就在他家，甚至群眾還指控他把大隊的糧食拿到外邊去賣。⁶⁷由此看來，中共統治下的農村幹部也多少帶有杜贊奇所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特質。

農村幹部或多或少都曾訴諸強迫命令的手段，以及多吃多佔，引起群眾的嫉恨，因此在 1964 年四清運動之際，幾乎所有的農村幹部都遭到批評。⁶⁸正如沙井村的張麟雲所言，凡當過幹部的都被追究，張本身擔任十年的生產隊長也遭到審查。有的如劉寶貴般，手段強硬，引起群眾較大的憤慨。有的則是像

⁶⁶ 《調查記錄》，卷 1，頁 96、113、120、124、268。

⁶⁷ 《調查記錄》，卷 1，頁 120、240。

⁶⁸ 1963 年河北保定地委針對農村社、隊，開展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即所謂「四清」運動。此一做法獲得毛澤東的贊同，因此向全國推廣。一般說來，在 1964 年後四清運動才逐漸全面鋪開，但各地開展的時間與運動的階段不盡相同。四清運動一直持續到 1966 文革爆發，可以說是文革的先聲。

吳店村自土改以來即擔任幹部的趙鳳鳴般，吃飯花錢的帳交代不清，遭到群眾指控。據各該村的訪談，在四清運動的氛圍下，連吃個蕃茄、茄子都會被當成多吃多佔，很少有幹部能全身而退。⁶⁹還有的只因過去分配工作時得罪了人，所以村民乘機報私仇。如寺北柴村的徐孟祥，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即擔任合作社社長，大躍進時期還擔任大隊長、支部書記。在四清運動時被指控貪汙了三千多元，即使他不承認也不行，後來就不當幹部了。村民說徐孟祥在四清運動時所以下台，實在是因為他當幹部的時間長了，難免有村民對他不滿。⁷⁰在吳店村有的村民就是乘四清運動報私仇，後來負責發動運動的工作隊走了，村民還罵工作隊沒給他們報私仇。四清運動時在吳店村擔任會計的田山也因此心灰意冷，從此拒絕別人動員他入黨，因為入黨就得當幹部，當幹部就會像四清運動時一樣挨整。文革以後，他就辭掉會計一職了。⁷¹

農村幹部被要求退賠，但被整死的似乎不多見。在這幾個村裡只有後夏寨的前鄉長李敬唐，因為在大會上被批判，覺得臉面不好看、怕丟人，因此上吊自殺。⁷²再者，四清運動時遭到批判的幹部，在運動結束後，有的獲得復職或改任其他職位，真正遭到撤職查辦者也不多。如寺北柴村的徐小和從 1955 年開始擔任該村會計，1965 年四清運動時上層為了防止農村幹部貪汙，要求各村會計要由外村人擔任，徐本人就被調到外地去當會計，寺北柴村的會計則由外村人擔任。該外村人做不到一年，又由遭到批鬥的趙球子接任會計。到了 1971 年徐小和又回村擔任會計，直到 1977 年。甚至如引起村民極大憤慨的劉寶貴，在四清運動後仍能繼續擔任政工員，負責管理社員的學習，每天到地裡幹活前，帶領群眾向毛主席宣誓，喊「毛主席萬歲」等等。⁷³

農村幹部沒有因為四清運動而被徹底打垮，也說明了 1949 年以後決定幹部去留最關鍵的因素，不是杜贊奇所謂約定成俗的文化網絡，也不是群眾的喜

⁶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163、705、719。

⁷⁰ 《調查記錄》，卷 1，頁 232、246-250。

⁷¹ 《調查記錄》，卷 2，頁 702。

⁷² 《調查記錄》，卷 3，頁 451。

⁷³ 《調查記錄》，卷 1，頁 113、274-275。

好，毋寧是上層領導的旨意。不僅黨支部書記，所有村幹部的去留全部取決於上層公社領導。如前所述，一個好的村幹部要能夠掌握國家政策，又了解村裡實際情形等等，並不容易。所以一個有能力的村幹部，公社領導當然不會輕易放他走。如侯家營在四清運動時有很多村幹部請辭，最後不少仍被公社慰留。⁷⁴

不過，四清運動對農村的領導階層還是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特別是各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例如，寺北柴村原來由徐孟祥擔任的支部書記一職，即由新幹部徐春梅接任。而且相對於徐孟祥這些長年擔任村幹部的年長者來說，徐春梅等新幹部多是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冀東的侯家營也是在四清運動之際，由原任支部副書記的「少壯派」侯元強，取代了從土改以來即擔任支部書記的「元老派」王元會，擔任支部書記。由此看來，四清運動似乎開啓或加速了農村基層幹部的世代交替。這一點留待下節再述。

四、四清運動以後農村基層領導的轉變

四清運動後如侯家營「少壯派」侯元強般的新任大隊領導，許多都是 1960 年代初，甚至 1950 年代末就已經在村裡服務了，如侯元強本人即是在大躍進時回村擔任幹部。後夏寨的支部書記馬鳳山也在四清運動後辭去了職務，他自稱是因為年紀大了所以讓年輕的幹。事實上，幹部的世代交替並沒有如此簡單，如侯家營的「元老派」幹部王元會被「少壯派」的侯元強取代後，一直心懷不滿，兩者勢如水火。負責推動該村四清運動的外來工作組最後決定站在侯元強一邊，撤銷了王元會的職務，侯家營的「元老派」至此完全讓出權力。後夏寨村民也說，馬鳳山事實上是被整下來的。接任馬鳳山擔任大隊領導的幹部王玉慶、吳丙臣、張良臣等人，也都比 39 歲的馬鳳山年輕，如張良臣當時約 30 歲左右，他們也是 1950 年代後期就開始在村裡服務。後來直到 1980 年，村裡仍是由王玉慶、吳丙臣、張良臣等人擔任大隊的主要領導。⁷⁵

⁷⁴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頁 30-31。

⁷⁵ 《調查記錄》，卷 3，頁 91。

如同侯家營的例子般，此一世代交替的現象是在中共當局的默許下發生的。在另一個華北地區的典範村莊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大躍進的災難導致國家減少對教育的補助，許多年輕人在 1960 年代初被迫回鄉從事勞動。1964 年前後雖然該村在全國聞名的勞動模範耿長鎖的保護下，沒有受到四清運動太大的衝擊，但是耿也呼應毛澤東、林彪的號召，開始培養「紅色接班人」，像是他的女兒耿慧娟就在此時被提拔為副民兵隊長。⁷⁶由此可見，四清運動前後村幹部的世代交替，既是客觀環境的變遷，如大躍進後年輕人的回鄉，也是國家政策有意無意推動下的結果。

耿長鎖提拔的年輕人，有他的女兒及五公村中與他要好的宗族的年輕人，這似乎反映了既存文化網絡的影響。但是，論者有謂，如侯家營新的「少壯派」和舊的「元老派」幹部間的最大差異，就是前者多是中共建國後農村教育普及的受益者，所以文化程度較高，也較少受到「自然紐帶」的影響。⁷⁷相反的，1950 年代的農村幹部，多是貧下中農出身，兼之他們年輕時農村教育不普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許多還是文盲。如四清運動前在寺北柴村擔任會計的趙球子，大約 1925 年生，僅曾在本村念過三年私塾，後來就在家裡務農了。⁷⁸

雖然文化程度較高，新一代的年輕幹部的實際工作經驗並不豐富。他們大部分都是在 1950 年代末，甚至四清運動前一、兩年才回到農村投入工作，最初大多是當會計，並非參加生產工作。如後來擔任沙井村婦女主任的史慶芬就是在 1950 年代接受教育，在大躍進結束前後被派到農村擔任大隊會計，後來才慢慢地往上爬，在 1970 年代後先後擔任大隊副書記、書記，以及大隊長等職。⁷⁹

儘管缺乏經驗，這些新上任的年輕幹部也能靠著積極工作，獲得村民的肯定。如同寺北柴村村民所言，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年輕領導不只是因為被工作隊

⁷⁶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2-25, 48-50.

⁷⁷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頁 36。

⁷⁸ 《調查記錄》，卷 1，頁 93、292。

⁷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125。

提名，還因為他們「有工作能力，能領導村生產，能解決村裡事」，既有能力辦上面的事，下邊的事也能給辦，所以村民才選他們。⁸⁰同村的徐春梅就是一個例子。徐春梅，女性，1946年生，1966年1月入黨，同年7月高中畢業，但她在前一年年底村裡四清運動時就回來了，那時她的父親是會計，徐幫她父親整理帳目。因為她有文化，在四清運動批鬥大會上也敢發言，在1966年5-6月間就被選上支部書記。作為一位年輕女性，一開始難免有人不服，但徐有能力，能落實上邊政策，與社員一起勞動，並且處理幹部與社員之間的矛盾等等，因此獲得群眾的認同。也因此，徐春梅當了三年支部書記後就被調任城郎公社副書記、副主任。城郎公社比寺北柴村更落後，工作更難，而且一個公社管十個大隊，由此也可見上層對徐春梅工作能力的肯定。接任徐的寺北柴村黨支部書記一職的劉玉合也是一位相當年輕的幹部，他在1970年接任支書一職時，只有19歲左右。⁸¹

這些村莊的黨支書等主要領導職位，在四清運動後普遍由較年輕且文化程度較高的「少壯派」接手。然而，一些需要工作經驗的職務仍由老幹部擔任。如寺北柴村的會計徐小和，還有後夏寨的會計馬會祥，他們在四清運動時都遭到批鬥，還被要求退賠，卻在運動後他們還是繼續擔任會計。其中馬會祥從1954年開始就擔任大隊會計，歷經四清、文革，該村書記、大隊長換了多次，他的會計職務卻一直沒有被動過，直到1985年退休為止。⁸²

在生產方面更是如此。蓋新的年輕幹部文化較高，論到生產經驗仍不如1950年代的老幹部，後者許多還是勞動模範，所以不少大隊長與隊長仍是由老幹部擔任。如沙井村的楊福，生於1921年，1949年時擔任村長，隔年即下台。他與同村的張麟富、張麟雲等人一樣，從集體化時期開始當生產隊長，作了二十餘年，直到1984年生產隊體制解散為止。⁸³文革期間擔任沙井村革命

⁸⁰ 《調查記錄》，卷1，頁124。

⁸¹ 《調查記錄》，卷1，頁119-121、255-259。

⁸² 《調查記錄》，卷3，頁139-141。

⁸³ 《調查記錄》，卷2，頁137-138。

委員會主任（文革時設立的黨政合一機構）的劉振海就說，當選大隊長的主要條件就是有能力，懂農業。年輕的劉振海在生產方面並不擅長，他在 1963 年才從初中畢業回鄉擔任生產隊會計，因為在四清運動時表現積極，被提拔擔任團支部書記，年紀約 20 歲左右，幾乎沒有什麼生產經驗。相反的，當時沙井村的大隊長還是由 1950 年代即開始擔任大隊長的老農杜作新續任，直到 1968 年杜過世為止，才由劉振海擔任革委會主任，作為黨政最高領導。⁸⁴寺北柴村的書記雖然由徐春梅取代四清運動時遭到批鬥的老書記徐孟祥，但大隊長也是由大躍進開始即擔任該村大隊長的劉文生繼續擔任，直到 1974 年劉被調到縣農場工作為止。⁸⁵當然，也有年輕幹部因為擅長生產而獲得重用。如侯家營新興少壯派領導侯元強的左右副手侯振興、侯永深，他們只有初小學歷，不像有初中學歷的侯元強般受到重用。但是他們擅長生產，如侯振興就擔任該村的副書記，主要抓生產和副業；侯永深則是一個生產能手，因此擔任大隊長。他們和侯元強一樣，都是新興的政治明星。不過該村生產隊長的變動也不大，因為該職務需要有豐富農活經驗的人。⁸⁶

相對於從事實際生產工作幹部的穩定性，新一代年輕幹部則可以說是激烈政治運動下的產物。他們有文化，懂政治理論，也有政治手腕，敢於投入政治鬥爭，侯家營少壯派的侯元強鬥倒元老派的王元會就是一個例子。與侯元強同村的侯大義也是一位年輕幹部，他在四清運動時就被派去各村協助發動運動，村民普遍認為他的政治理論水平極高，能夠出口成章，所以在 1969 年就擔任侯家營的副書記，成為侯元強的副手。⁸⁷又如寺北柴村的徐春梅也是在四清運動上敢於講話批評的積極分子，還有沙井村的劉振海也是該村一個紅衛兵組織的領導者，他們都經過政治鬥爭的洗禮。

⁸⁴ 《調查記錄》，卷 2，頁 58-59。

⁸⁵ 《調查記錄》，卷 1，頁 81。

⁸⁶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頁 33、36。

⁸⁷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頁 37。

吳店村的郭仲安也是紅衛兵領導出身。吳店村的文革在這幾個村子中，算是比較激烈的。據村民的訪談，吳店村既鬥地主、富農、黑五類，也鬥當權派，一些老幹部即被當成當權派打倒。郭仲安生於 1938 年，與其他各村四清運動後新上任的年輕幹部相比，郭的學歷比較低，只有小學學歷；而且郭的年齡也稍大，但也因此具有較多的實際生產經驗，在 1950 年代時即曾參加農業勞動，後來又到北京市的長陽國營農場工作，有工人身分。郭仲安在 1960 年代後半發跡，正是因為文革時他是村裡造反派紅衛兵的頭子，帶頭反對大隊書記王德林（當權派），郭認為王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又與地主、富農有關係。王德林是一位老幹部，從土改即開始擔任幹部，後來也曾到縣裡建築公司工作。當郭在 1962 年回村時，王正好從該年開始當支部書記。郭因為公仇加上私心雜念，文革時就組織紅衛兵批鬥王，要王爬著、跪著，王也因此於 1966 年卸任，兩人從此成為仇讎。郭與紅衛兵還整了其他許多人，如該村有一個貧農出身的宋瑞，曾作過工頭，那時郭仲安只是一個小工，宋沒有用郭，郭在文革時就把宋整得跳井自殺了。郭因為積極鬥爭，獲得軍隊的青睞，後來被提拔到公社，從 1968 年開始擔任公社副主任。⁸⁸

郭仲安與王德林的鬥爭也突現了 1960 年代年輕幹部與 1950 年代老幹部之間的差異。郭代表的是較年輕的一輩，擅長操作政治話語與運動是他獲得青睞的原因之一。相反的，王德林等老一輩的幹部，包括同村的老支部書記趙鳳鳴，則在文革時被當成當權派批鬥。老幹部不像年輕幹部般文化高，政治理論與能力也不如年輕幹部，儘管他們有較豐富的勞動經驗，但這項能力在文革時期並未受到重視。如趙鳳鳴的老婆李鳳琴後來就抱怨說，「當時勞動好的就有罪」。李長期擔任吳店村的婦女主任，文革時村裡不讓她擔任婦女工作，她說這正是因為她勞動好的緣故。⁸⁹

當然，四清運動後新上任的年輕幹部在成為當權派後，自身也可能成為被鬥爭的對象。例如在後夏寨，四清運動後老支部書記馬鳳山被整下台，由王玉

⁸⁸ 《調查記錄》，卷 2，頁 671-679、686。

⁸⁹ 《調查記錄》，卷 2，頁 734。

慶、張良臣輪流擔任支部書記。王、張等人較馬年輕，當時也已 30 歲左右，比起他村四清運動後的新領導如徐春梅、劉振海等人，年紀稍大；而且他們在 1950 年後半即開始在該村擔任幹部，也是有一定資歷的幹部。在文革爆發後，復員轉業軍人劉希林與王維寶等人起來組成造反派紅衛兵，攻擊王玉慶等現任支部書記，其中王維寶即是一位 25 歲左右的年輕幹部。最後村裡取消黨、團組織，成立村民委員會，由劉希林擔任主任。後來劉希林也像郭仲安一樣被提拔到公社去了。⁹⁰

有時候年輕幹部的挑戰是來自被打倒的老幹部。侯家營「元老派」王元會在被拔除支部書記的職位後，一直對新書記侯元強心懷不滿，文革時即向該村的紅衛兵「紅農大隊造反組織」提供侯元強的材料，想藉此扳倒侯元強。但是王元會沒有得逞，反而在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從原來的「四不清幹部」進一步被定位為「歷史不清」，被控告曾當過「偽」先生，給國民黨送過糧。侯元強本人則一直擔任支部書記，直到 1973 年被提拔至公社採石場工作為止。

不難發現，被提拔為公社幹部，在四清運動後新上任的年輕村領導間似乎是頗為普遍的現象。如寺北柴村的徐春梅、吳店村的郭仲安，還有侯家營的侯元強，以及他的副手侯大義，都曾被提拔為公社幹部。公社幹部是國家幹部，收入較高，也有退休金的保障，還有機會被派到城市工作，有更多升遷的管道；村級幹部不屬國家幹部，他們的收入依賴本村，也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只能在村裡服務。因此，對於大多數的幹部來說，能夠被提拔為公社幹部，代表受到國家的重用，是很大的光榮。⁹¹

論者有謂，「國家幹部是名稱好聽，但是其中許多職位是沒有什麼前景的。做個農村幹部要是幹到大隊黨書記，下面有數百人聽命於你，等於是村子的真正統治者。但是要是做國家幹部，也許手底下只有一、二十個掃街的工人」。⁹²

⁹⁰ 《調查記錄》，卷 3，頁 416-417、427。

⁹¹ 黃樹民著，素蘭譯，《林村的故事——1949 後的中國農村變革》（臺北：張老師出版社，1994），頁 209。

⁹² 黃樹民著，素蘭譯，《林村的故事——1949 後的中國農村變革》，頁 209。

後夏寨村支書馬德昌也說，「我去做工作，大家聽，聽我的。因為在村內，書記擁有最高權力了」。⁹³所以很多被提拔到公社的村領導，最後仍舊選擇回到村裡服務。如侯家營的侯元強在 1973 年被提拔到公社工作後，由侯大義接任黨支書；1977 年侯大義也被提拔到公社工作，侯元強則回村接任黨支書；到了 1980 年代，侯大義也回到村裡工作。又如吳店村郭仲安，在村裡有關係吃得開，在 1961 年糧食困難時期結婚，就有幹部和朋友私下給他糧食和酒來辦喜宴。但是郭被提拔為公社副書記後，村裡的關係就不起作用了。郭也承認他因為既沒有文化，在縣裡也沒有後台，不可能再繼續往上爬，因此他做了兩年公社副書記後，就不想做了。⁹⁴

因為村幹部的關係和群眾基礎主要在村裡，一旦脫離村莊就意味著失去了影響力，所以擔任公社幹部並不見得是一項較好的選擇。如沙井村四清運動後新上任的村領導劉振海就沒有離開過村莊。劉在村裡也有他的群眾基礎。當時沙井村在文革時主要有兩個群眾組織「紅衛兵」與「衛東造反軍」，其中參加前者的多是該村的第一生產隊，參加後者的則是第二生產隊。原來第一生產隊是由較貧窮的戶組成，人數較多，因此各人平均分得的糧食也比較少；第二隊則是由家境較好的戶組成，佔有較好的地，擔任幹部的人也較多，如此就慢慢地拉開了兩隊的貧富差距。所以沙井村兩派紅衛兵之爭，還反映了村內的「階級矛盾」。而在 1967 年後擔任該村革委會主任與黨支書的劉振海就是第一隊的成員與「紅衛兵」領導，他一直都沒有離開村裡，直到 1978 年才由李景春接任黨支書，後者原來也是第二隊的成員與「衛東造反軍」的領袖。他們各自有其群眾基礎，藉此互相競爭，以致演變成持續性的派系鬥爭。如李景春批評第一隊貧下中農多，好鬧事，眼光不遠，「紅衛兵」就是由一些愛鬧的年輕人組成的。他所以要成立「衛東造反軍」，就是為避免這些愛鬧的年輕人耽誤農活。至於劉振海，李則說他「年輕，有闖勁」，這實際就是暗諷他是愛鬧的年輕人，儘管劉的年紀稍大於李（劉生於 1942 年，李生於 1943 年）。直到 1990 年

⁹³ 《調查記錄》，卷 3，頁 435。

⁹⁴ 《調查記錄》，卷 2，頁 678。

代接受訪談之際，李還批評劉振海擔任黨支書的領導班子，批評他把扒雞廠搞壞了，說他們不行，眼光短淺。由此看來，沙井村的「階級鬥爭」還未止息。⁹⁵

這樣的派系衝突，有時還反映了村裡既存的宗族界線。如 1970-1973 年間擔任寺北柴村黨支書的劉玉合就說，在他任內最困難的工作就是派系鬥爭，姓王、姓張、姓趙的各一派，其中趙姓內部還分成兩派。另一位寺北柴村村民劉繼晨也提到，當時大隊幹部的分配必須考慮到照顧各姓氏大戶，譬如書記是姓郝的，村長就是姓徐的，會計則是姓趙的等等。這樣的情形在 1950 年代時肯定也存在，如劉繼晨即說該村同姓的大部分都住在一片，土地也集中在一起，即使在中共建政並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仍舊如此。所以同姓間關係較好，也比較團結。⁹⁶在吳店村亦是如此，1950 年代的村幹部趙鳳鳴就沒有答應同族「走後門」的要求，因此引起同族的反感；到了文革時期，該村的領導為郭姓所奪，那時入黨的也多為郭姓，他們的同族和親戚都沒有受到打擊。同村郭仲安在文革時的得勢，與同族的支持當不無關係。⁹⁷

村幹部的群眾基礎反映了既存的宗族界線，證明了即使在中共建國後，杜贊奇所謂的文化網絡對村內統治權力的建構仍起著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此一面向亦不容誇大。首先，並非所有村幹部都會眷戀他們在村裡的影響力與群眾基礎。如寺北柴村的徐春梅就認為，村書記得面對千家萬戶，吃喝拉睡和家庭生活都得管，所以她認為越基層工作越難，公社工作還好些。因此徐春梅自 1969 年被調到公社工作後，一直到 1981 年都還在公社工作。⁹⁸

再者，即使既存的文化網絡仍或多或少發揮其影響力，卻也不是居於關鍵地位。上述文革時派系衝突反映村內宗族界線的寺北柴村、吳店村，在 1940 年代的滿鐵調查中，雖然也表現出一定的宗族色彩，如吳店村當時全村 50 餘戶，其中郭姓 15 戶，禹姓 7 戶，楊與王姓各 6 戶，趙姓與李姓各 4 戶，餘為

⁹⁵ 《調查記錄》，卷 2，頁 58、209、236-237、248-251。

⁹⁶ 《調查記錄》，卷 1，頁 116-118、120-121。

⁹⁷ 《調查記錄》，卷 2，頁 647。

⁹⁸ 《調查記錄》，卷 1，頁 259。

小姓；寺北柴村 140 戶中，郝姓 53 戶，徐、劉、趙姓各 20 餘戶，餘為小姓。⁹⁹但是比起侯家營來說，這兩村的宗族色彩則遜色許多，如侯家營全村 117 戶中，侯姓即佔了 84 戶，第二大姓劉姓才 10 戶。另一個後夏寨全村 130 戶，王姓佔 51 戶，第二大姓馬姓 30 戶，其次吳姓 18 戶，餘皆不超過 10 戶的小姓，也表現了某種程度的宗族色彩。¹⁰⁰那麼，侯家營、後夏寨文革時的派系衝突有無反映既存的宗族界線呢？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恐怕也在所難免。不過，如後夏寨的例子，村幹部的去留最後還是取決於上層領導的態度，其次才是群眾的意向以及所謂既存的文化網絡。

如前所述，後夏寨在四清運動後由王玉慶接任黨支書。大概在 1966 年左右村裡的黨、團組織一度取消，組成村民委員會，由紅衛兵劉希林擔任主任作為最高的村領導，王玉慶擔任副主任；不久後，劉希林被提拔為公社幹部，再由王接任村的領導職務。王有能力，但是心眼太多，好算計人，態度又生硬，得罪了不少人。上面因此下來與王溝通，王想不通，不得已，公社只好免了王黨支書的職位，由村內黨員選出張良臣（該村支書是由公社提名，村內黨員選舉）接任，時為 1978 年。張良臣雖然獲得群眾支持，他的工作能力實在不行，結果只做了一年多，公社因此再提名王擔任黨支書。可是投票時只有三名黨員舉手贊成，公社因此又下來對黨員逐一進行訪問，做思想工作，最後才獲得三分之二黨員的同意票，使王再次上台。由此可見，能否擔任村領導，關鍵還是在於上層的旨意，群眾的支持只是其次。況且，群眾的支持也不是取決於宗族派系，如王姓雖是村內最大姓，王玉慶也不能獲得多數支持。相反的，群眾也會看幹部的能力，如張良臣事實證明沒有能力，兼之個人思想嚴重，遇事斤斤計較，以致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後來王玉慶在上台一年後因病離職，群眾即擁

⁹⁹ 《慣行調査》，卷 3，〈河北省樂城縣寺北柴村の概況〉，頁 6；《慣行調査》，卷 5，〈河北省良鄉縣吳店村の概況〉，頁 6。

¹⁰⁰ 《慣行調査》，卷 5，〈河北省昌黎縣侯家營の概況〉，頁 5；《慣行調査》，卷 4，〈山東省恩縣後夏寨の概況〉，頁 10。

護吳丙臣續任，因為吳被認為是一位厚道、正直，心胸寬闊，且有能力的幹部。¹⁰¹

事實上，在文革結束以來，政治激情過後，其他各個村莊的領導也傾向由像吳丙臣般既有能力，且厚道、正直、穩重，能獲得群眾信賴的幹部擔任，而不是像文革期間傾向由年輕激情的幹部來擔任。這是下一節欲探討的主題。

五、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基層領導的轉變

如前所述，文革時期有些村領導被提拔擔任公社幹部，但不久後他們又回到村裡服務，如侯家營的侯元強、侯大義等人。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們一樣還有機會回到村裡服務。如吳店村的郭仲安在文革時被提拔為公社副書記，不過兩年即 1970 年，他就想辭去公社副書記（但依舊掛名，直到 1981 年才正式解除職務），希望回到村裡服務。但也是在同一年，過去被郭打倒的王德林又被扶起來當村領導，原因即在於村民認為他在種地上有一套。至於郭仲安，雖然他聲稱在王德林當黨支書時，村裡虧糧達 8 萬斤；在他打倒王德林接手後，村裡開始賣餘糧。但是王德林派終究打倒了郭仲安派，村民也不再欣賞郭仲安。郭在 1980 年代在村裡辦了一個磚廠，村裡對他有意見，告他貪汙，以致他好一陣子沒活做，賺不到錢，老伴也病得變了樣。村民諷刺他說文革時「盡整人」，現在待在家沒事，整天騎著小三輪帶著老婆子到處轉，不務正業。當然，王德林也不是完全沒問題，也有人說他作風不正派。可是他有辦法，1974 年後出去工作，賺了一些錢，給村裡修了路，蓋了樓，還當上建築公司書記，村裡人也跟著有錢賺。大家稱讚他，再度擁護他當村領導。¹⁰²

在其他各村也可以發現，伴隨著文革退燒，特別是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像王德林一樣的老幹部重新獲得重用。例如在沙井村，1967 年後先由紅衛兵領導劉振海擔任革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劉做到 1978 年，由該

¹⁰¹ 《調查記錄》，卷 3，頁 432、438-439。

¹⁰² 《調查記錄》，卷 2，頁 678-680、686-687、728、731。

村另一派紅衛兵組織（衛東造反軍）的頭子李景春接任書記；李做了才兩年，便由老書記張麟炳於 1981 年接任。張麟炳生於 1924 年，1957 年即開始擔任沙井村黨支部書記，直到四清運動時才被撤掉書記職務，由李繼清接任，李之後就是劉振海。張在 1981-1982 年做了兩年書記後，還繼續擔任副書記等職，直到 1990 年代。¹⁰³

在寺北柴村，文革初期是由徐春梅擔任黨支部書記，後由郝鎖真接任，1973 年後由生於 1942 年的郝同順擔任書記。這三個人文化程度較高，而且他們在回鄉後都先擔任會計，然後才接任書記，這是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年輕幹部的普遍經歷。郝同順擔任書記將近十年，到 1982 年復由曾任 1950 年代合作社社長與書記的徐孟祥接任，徐做到 1986 年六十多歲才卸任。同時與他一起復職的還有 1950 年代的會計趙球子，徐與趙兩人在四清運動時皆遭到批判而下台，趙球子卸任後即是由徐春梅、郝鎖真、郝同順先後接任會計。徐孟祥復職後，趙也重新擔任會計。不只是幹部，據徐所言，1990 年代日本學者前來訪問之際，村內黨員也是以大歲數的居多，其中 50 歲以上的即佔了一半。¹⁰⁴

爲什麼會出現老幹部復職的現象呢？這些村的訪談者並沒有交代，但也不難猜測，在經過數年的動蕩以後，村民也許更懷念他們所熟悉的 1950 年代的老幹部。這些老幹部不像四清運動後的年輕幹部那樣「紅」，那樣激情，但都能勞動，敢吃苦，比起年輕幹部來說更令人感到踏實。而且他們復職後確實也展現了能力。像是 1980 年代復職的沙井村老書記張麟炳，連四清運動後擔任黨支書的劉振海也誇讚張「很能幹」。¹⁰⁵

當然，即使是四清運動以後靠著政治鬥爭起家的年輕幹部，也可以靠著能力獲得村民的認同。如後夏寨村村民就認爲，該村文革時靠著鬥爭當上村領導的劉希林，本事不大，沒有水平；但是與劉希林一同鬧事的紅衛兵王維寶則被

103 《調查記錄》，卷 2，頁 218-227。

104 《調查記錄》，卷 1，頁 97-100、242-244。

105 《調查記錄》，卷 2，頁 218。

認為「大膽潑辣，有工作能力」。後來劉希林的下場，不得而知；但是王維寶在改革開放以後擔任該村的大隊長，受到擁戴。¹⁰⁶

況且文革過後老一輩幹部即使再獲得重用，畢竟年歲已大，沒辦法再服務幾年。所以各村的幹部還是以年輕一輩的幹部居多。如沙井村的 1950 年代老幹部張麟炳（生於 1920 年代）復職接任黨支書後沒幾年，又由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史慶芬（生於 1940 年代）接任，擔任村長的則是生於 1950 年代更年輕的杜江。在寺北柴村，徐孟祥於 1982 年復任黨支書時，村長即是由 1954 年生的郝小六擔任，他與生於 1930 年代前後的徐孟祥差了二十至三十餘歲。1990 年代擔任寺北柴村書記與村長的郝元增、徐玉身等人，也都是 1950 年代出生的新一輩年輕幹部。¹⁰⁷順便一提的是，1980 年代以後公社體制在各地陸續解體，生產隊取消，大隊改制為村，大隊長也恢復村長的稱謂。不過村裡最高領導依舊是黨支部書記。

如果我們把 1950 年代的老幹部，和四清運動後與改革開放後新上任的幹部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後新上任的幹部與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類似，學歷都較 1950 年代的老幹部高，其中又以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文化程度最高。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後上任的新幹部上學時因為遇到文革，所以學習都不強。如郝元增生於 1958 年，8 歲開始上學時適逢文化大革命，初中一年級時學生都去參加鬥爭，老師也管不了，郝上到初中一年級就回家了。¹⁰⁸

不過，改革開放後新上任的幹部比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有較多的工作經驗。如前所述，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大多是在 1950 年代末期以後，有的甚至是在四清運動前夕才回鄉工作。四清、文革打倒 1950 年代的幹部後，他們接任村的領導職務，很多人都沒有足夠的基層工作經驗。相反的，改革開放後的新幹部，有的 1970 年代就畢業回鄉，等到他們在 1980 年代，甚至 1990 年代接任村領導期間，已經累積了不少工作經驗。如寺北柴村的郝元增在 1973

¹⁰⁶ 《調查記錄》，卷 3，頁 439。

¹⁰⁷ 《調查記錄》，卷 1，頁 86-89、145-156。

¹⁰⁸ 《調查記錄》，卷 1，頁 149-150。

年畢業回鄉後，當了幾年的拖拉機手，後來又入伍，在部隊裡入黨。當了四年兵後郝回家買了貨車從事運輸，一直到 1991 年才被推薦支部副書記，1994 年後擔任支部書記。¹⁰⁹

1988 年開始擔任沙井村村長的杜江也是一個例子。杜在 1990 年受訪時 36 歲，生於 1955 年，1972 年初中畢業。因為文革的耽誤，他沒有上高中，初中畢業後即回生產隊勞動。杜說他父母沒有念書，一直務農，沒有給他當幹部創造什麼條件，這也暗示了當時當農村幹部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及關係。等到杜被選拔當上大隊會計之後，才開始被當成栽培對象。以後杜歷任治保主任、民兵連長、生產隊長、貿易貨棧經理，等到 1988 年才當上村長。村長雖然是開放群眾選的，但「也不是很放開的選」，候選人是由上邊決定後才讓群眾投票，選出後還要通過鄉的認可。所以能不能當幹部還是由上面決定，「即使願意當也不行」。杜江的例子告訴我們，改革開放後上任的新幹部不像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般，可以一步登天，而是要經過漫長的經驗積累，以及上面的觀察，等到有足夠的能力以及關係後才獲得提拔。杜江說這就如鄧小平的理論般，「得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¹¹⁰

其他村改革開放後上台的新幹部，大部分也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爬上來的。如沙井村的楊豔玲，1957 年生，19 歲高中畢業後回到生產隊工作，一邊記工，一邊當保管，後來才到生產大隊當會計。¹¹¹又如後夏寨的馬德昌，生於 1954 年，畢業後先到工作隊工作，後來回到村裡先後擔任教師以及統計員，等到老支部書記吳丙臣死後，才由他接任書記一職。同村的馬長祥就說沒有人一回來就當支部書記的。馬長祥本人也是從 1969 年開始當生產隊副隊長，1974 年當正隊長，到了 1985 年才被提拔為大隊幹部。¹¹²

¹⁰⁹ 《調查記錄》，卷 1，頁 145-150。

¹¹⁰ 《調查記錄》，卷 2，頁 48-58。

¹¹¹ 《調查記錄》，卷 2，頁 132。

¹¹² 《調查記錄》，卷 3，頁 571-572。

不僅如此，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當農村幹部，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就是農村出路變多了，當幹部不再是唯一飛黃騰達的途徑，反而吃力不討好。如郝元增本來是從事運輸，後來才把車賣了，轉行當幹部。對他來說從事運輸可以發財，當幹部則不然，他認為年輕人不應該只是爲了發財，所以才願意回村當幹部。但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甘願放棄發財的機會，爲村裡服務。同村的郝同順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擔任村書記，後來調到鄉裡工作，由徐孟祥接任，兩年後郝同順又回村接任徐孟祥的書記，一直作到約 1994 年才辭去，由郝元增接任。而郝同順辭書記的理由，即是因爲他辦了廠，沒有空擔任書記的工作。另一位同村的郝小六，在 1983-1994 年間當村長，但同時也買拖拉機從事運輸，又辦廠做粉條，村長的活他也不想做，所以在 1994 年就辭掉了。¹¹³後夏寨的馬德昌也是如此。他在 1980 年前後接任黨支部書記一職。據其所言，改革開放後農村家家戶戶都有副業，他自己也在外邊兼差跑買賣，買賣辣椒和石油。馬德昌就說大部分村莊的書記，都有兼差從事掙錢的副業。¹¹⁴

據被調到公社工作的前寺北柴村黨支部書記徐春梅所言，大部分有才能的村幹部，私心較大，他們在改革開放後都出去自己做生意；留下來的幹部素質很差，「盡打撲克、打麻將，把時間都浪費了」。¹¹⁵沙井村亦是如此，如 1950 年代即在沙井村擔任幹部的楊福就說，沙井村未來沒有大發展，因爲現任的幹部裡沒有人材。¹¹⁶

幹部不安心作工作，正反映了外在大環境的變遷。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逐漸起飛，幹部與群眾更關心的是發家致富，而不是聽黨的話；個人利益的考量勝過集體利益的考量；願意投入農業生產的人，也日益減少。據這幾個村被採訪的幹部所言，在 1950 年代村民比較單純，也比較聽上面的話。簡單地說，「那時你不走共產黨的道，就是反社會主義」。所以政策容易貫徹，「人心還

¹¹³ 《調查記錄》，卷 1，頁 88-89、100-101。

¹¹⁴ 《調查記錄》，卷 3，頁 439-440。

¹¹⁵ 《調查記錄》，卷 1，頁 259。

¹¹⁶ 《調查記錄》，卷 2，頁 145。

行」。而且那時的幹部與群眾也比較肯幹，幹部都能以身作則，與群眾一起勞動，辛苦地做群眾工作。像是吳店村趙鳳鳴的妻子就說「解放了，土改了，心情愉快，幹什麼都很積極」；前面提到同村的郭仲安也說，1950年代的人「剛從舊社會解放出來」，幹勁特別足。¹¹⁷

四清運動後上任的幹部仍是如此，如四清運動後擔任沙井村幹部的史慶芬就說，幹部「要起表率作用，幹活時爭取幹在前頭，吃苦在先，享受在後」。史慶芬在1968年結婚時，爲了帶頭移風易俗，婚禮從簡，被迎娶時既沒坐轎子，男方也沒派人去接她，是她自己騎自行車在家人陪同下到夫家的。結婚儀式就單單向毛主席像鞠躬，唱毛主席語錄歌等，據她說他們是沙井村第一對採取這種結婚儀式的。1969-1974年間史擔任婦女主任，爲了貫徹黨中央一胎化的政策，黨員、幹部也要帶頭只生一個孩子，然後才深入到戶，反覆地做群眾的思想教育工作。不過當時村民已再不像過去般容易接受上面的政策。據1960年代後曾任沙井村生產隊長的張樹德所言，如果上面要推行什麼政策，首先村裡的幹部就得學習，然後對廣大群眾宣傳。群眾會質疑，幹部如果不能回答，甚至胡說，群眾就不相信了。¹¹⁸

整體說來，在1980年代前的集體化時期，村民相對來說仍比較聽話，當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之際，一開始村民還不願意，因爲他們已經習慣被動地聽上面的話，上面讓幹啥就幹啥。改革開放後就不一樣了，村民分得了自己的地，開始要爲農活操心，爲自己的生活負責。隨之而來村民的自主性也增加了，他們不再留戀過去集體化時代，集體觀念逐漸淡薄。據寺北柴村的徐春梅所言，過去公社開大會，幾百個村民都去了；現在村民都是一家一戶，只知道一家人看電視，不管集體的事。黨推動什麼政策也難以貫徹到一家一戶。¹¹⁹吳店村1950年代的婦女主任李鳳琴也說，過去村裡要開會，大喇叭一叫，就算家裡有地要鋤，每家也來開會；但現在人們都只在家裡看電視，聽廣播，不想再

¹¹⁷ 《調查記錄》，卷2，頁674-675、734。

¹¹⁸ 《調查記錄》，卷2，頁77、126-127。

¹¹⁹ 《調查記錄》，卷1，頁233、259。

聽村幹部的宣傳了。¹²⁰究其實，群眾思想變了，每個人只想做自己的個體經濟，不管集體事業，幹部難以動員組織村民，做不起集體事業，也就放鬆了工作。就像徐春梅說的，把時間都浪費掉了。

因此之故，改革開放後幹部的角色也逐漸發生改變。過去幹部要積極主動地為群眾安排工作，現在幹部則是被動地等待群眾來要求幫助。又，過去幹部的的主要工作是為群眾安排農活，現在幹部則要想辦法為群眾找其他出路，讓他們能賺錢，富起來，但「這是個困難事」。如果幹部推動的是賺錢的事，就算幹部不號召，群眾自己也會幹；如果不賺錢，任憑幹部如何地號召，群眾也不願意幹。¹²¹這是一個標榜發家致富的年代。

六、結 論

不同時代的中國農村需要具有不同特質的基層領導。清朝末年的村莊領導大都是有土地有閒，以及受人敬重、有威望的富人；他們只需要管好村內事務，無須經常與國家打交道。民國以後國家對農村的的要求逐漸增多，所以村莊領導除了有人格、威望之外，還要具備支應國家與各方政治勢力的能力和關係。1949年後中共高舉階級鬥爭的口號，同時強調糧食生產，因此成分好以及擅長勞動生產的農村幹部受到提拔，土地、財富反而成爲政治負擔。四清運動以後，緊接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在激情的政治氛圍下，缺乏勞動經驗但文化程度較高的年輕幹部藉著政治鬥爭，成爲新一代的農村基層領導。1970年代以後隨著文革的退燒，老一輩有生產經驗的幹部捲土重來，擔任村莊的領導。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更看重的則是村莊領導能否帶領他們發家致富。今日中國農村群眾又是看重農村基層領導哪一方面的能力呢？仍有待吾人進一步探究。

因爲對於農村基層領導的要求與時俱變，所以就不能以農村基層領導是否出於既存的文化網絡來判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杜贊奇即認爲民國時期國家

¹²⁰ 《調查記錄》，卷2，頁734。

¹²¹ 《調查記錄》，卷3，頁507、572。

企圖在既存的文化網絡外建立新的政治體系，結果其在農村裡的代理人，既不能為地方群眾所接受，只圖為國家與自身謀利，成為所謂贏利型國家經紀，最終就導致國家內捲化的後果。

雖然杜贊奇的書只談到 1942 年，無法要求他用民國時期對農村的觀察來檢視 1949 年後的中國農村。不過，其他學者論及中共統治下的農村時，也指出國家為了深入社會，不得不利用既存的社會結合如宗族力量等，即杜贊奇所謂的文化網絡。¹²²但是，如前所述，1949 年後中國農村體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的一黨專政。從共軍進入農村一開始，農村的基層領導階層即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窮人取代富人成為村莊領導，勞動能力成為評量農村幹部的指標，還有黨支部的設立，掌握了村莊最高的領導權。也正如前述，即使在文革時期，既存的宗族關係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影響著村莊內部的權力建構，但幹部的任命與去留最終仍取決於上層的黨政領導。國家對農村的深入，與日俱增。這些是清末至民國時期所沒有的現象。時代的巨輪不停地向前轉動，不同的時代需要不一樣的農村基層領導，以及不一樣的國家與農村關係的結合。以往靜態的分析模式側重觀察農村基層領導是否契合既存的文化網絡，但這樣的分析模式並不能掌握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動態變遷。

最後，本文也證明用田野調查等口述歷史材料探究二十世紀中國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演變的可行性。如同檔案文獻，口述歷史資料也有其限制，所以筆者在寫作過程往往需要對照其他受訪者或其他村莊的口述材料後，才可能得出某一時期農村領導大致的圖像。但是，不可否認的，口述歷史資料提供了檔案文獻裡所缺少的底層農民的觀點，也把農村領導與其他人物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既補足檔案文件的不足，也提供了另一個觀察二十世紀中國底層農村歷史的視角，值得吾人再進一步深入探索。

¹²² 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造》（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頁 335-339。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北京市檔案館等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冊 3（1951）、11（1959）、12（1960），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2004。

《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魏宏運、三谷孝、張思主編，《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卷 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卷 1-6，東京：岩波書店，1952。

二、專著

張思等著，《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黃樹民著，素蘭譯，《林村的故事——1949 後的中國農村變革》，臺北：張老師出版社，1994。

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三谷孝編，《村から中国を読む：華北農村五十年史》，東京：青木書店，2000。

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造》，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e Transition of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Or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Chen Yao-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transition of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ing the Mantetsu surveys and other scholars' village studies of North China. Scholars such as Prasenjit Duara also used Mantetsu surveys to explore rural North China before 1949, and Duara proposed the famous theory of state involution. This article will also review this theory. Moreover,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transition of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after 1949. Wa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before and after 1949? And what happened to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in the 1950s, 1960s, and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 in 1980s? Finally, how did objective context and state policy influence the transition of North China's rural leadership? This article targets these subjects.

Keywords: village surveys of Mantetsu, oral history, state involution, rural leaders, rural cadre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